

“自由糖”与“奴隶糖”：东西印度糖产业之争（1791-1833）

程海龙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福州市，350007；chlhalo@163.com）

摘要：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自由贸易思想以及废奴运动等因素的出现，英帝国的统治方式也产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一时期，以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为代表的奴隶种植园经济模式受到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与废奴主义者的挑战。后者为打破前者在英帝国市场内的垄断地位，从废奴主义角度批判西印度群岛蔗糖业，鼓吹以东印度的“自由糖”来取代西印度的“奴隶糖”，但在西印度集团的反对下失败。这一历史现象的本质是重商主义与自由贸易之争，凸显了废奴运动的道德理想与殖民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成为英帝国从旧帝国向新帝国转变的历史阶段中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蔗糖；奴隶制；废奴运动；西印度群岛；英属印度

引言

在重商主义的推动下，17世纪初英国便开始在加勒比海地区殖民。1640年代后，英属西印度群岛引入甘蔗，掌握了制糖技术，在《航海条例》的支持下，西印度群岛蔗糖业迅速发展成为殖民地乃至英帝国的支柱产业。1660年代后，黑人奴隶的大规模引入使奴隶种植园制度成为殖民地的主要生产方式[1]。同时，英国于1600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着手进行对远东地区的殖民活动。印度确实存在蔗糖业，但受到西印度的蔗糖垄断影响，印度蔗糖在帝国中的贸易占比极低，一直到1807年，印度的蔗糖出口量仅占北大西洋市场消费总量的2.3%，而西印度群岛则高达80.2%[2]。18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自由贸易思想以及废奴运动的逐渐发展，新兴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废奴主义者力图打破西印度集团的蔗糖垄断地位和奴隶制生产方式，领导了一场抵制西印度奴隶生产产品的戒绝运动（Abstentionism），到了1820年代又进一步发展为具体要求东西印度蔗糖关税平衡的运动[3]。两场运动在西印度集团的强烈反对下最终以失败告终，并且后者利用各方资料揭示了印度劳工并非真正自由这一现象，对废奴运动造成了十分负面的影响，彰显了英帝国转型时期“经济利益至上”的重要历史特征。

1. 西印度“奴隶糖”的繁荣与废奴主义的兴起

公元1000年左右，蔗糖的存在几乎不为欧洲人所知。至1650年，英国贵族与富人已嗜糖成癖，蔗糖不仅可入药，更融入文学意象与阶级象征之中。而到工业革命之时，糖虽价格不菲且供应有限，却已成为每个英国人饮食中不可或缺之物[4]。西印度群岛的蔗糖产业则是帝国贸易中极为重要大宗商品，1770年代，西印度群岛蔗糖年均出口量占英国进口量的80%以上，约每年10万-12万吨，约占英国殖民地贸易总值的25%[5]。甘蔗与蔗糖是与奴隶劳动直接相关的近代全球化农产品，被称为“最先改变了历史的世界商品”[6]。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生产到17世纪下半叶后便是完全由奴隶制所主导，并且殖民地享有《航海条例》所带来的贸易和关税特权，这一优势地位造就了其在帝国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因此，于18世纪末逐渐兴起的废奴运动以及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为自身利益就以糖为对象，掀起了一场抵制西印度“奴隶糖”的戒绝运动。1791年，浸信会废奴主义者威廉·福克斯（William Fox）发表名为《致大不列颠人民书》的小册子，标志着戒绝运动的开始[7]。福克斯主张英国人民必须通过对种植园主施加经济压力，迫使他们转向自由贸易与自由劳动的生产方式[8]。尽管戒绝运动本身在18世纪90年代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而逐渐没落，但是当19世纪20年代废奴主义者再次投身于废奴事业时，该运动重又兴起，成为废奴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8]。

1.1. 戒绝运动中的血泪糖话语

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糖在英国社会的逐渐普及，以及糖与茶的不可分割性 [5]，这一重要商品更是受到英国社会的特别关注。然而，进口英国的糖大多来自以奴隶制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西印度群岛。受到这一时期兴起的废奴运动的影响，糖成为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商品，喝不含糖的茶在废奴主义者的圈子内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行为 [9]。同时，在工业革命中兴起的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也有着反对西印度群岛贸易特权与关税特权的需求。而废奴主义者与工业资产阶级本就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重合性，戒绝运动就是在其领导下进行的。

反对“奴隶糖”的言论在这一时期便有出现。英国著名东方学家与东印度公司官员威廉·琼斯爵士在1780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有人曾说，若非西印度群岛的黑奴劳作，糖价必将昂贵至极……然而无论糖价多高，与其违背铭刻在未被贪婪玷污者心中的自然法则，与其剥夺造物主赋予人类不可剥夺的永恒权利——这权利世间任何律法都无权褫夺——我们宁可戒绝食糖，若仅为甘甜之味，蜂蜜亦可替代；纵使黄连苦胆，亦胜悖逆天理。” [10] 尽管这一时期戒绝运动并未正式开始，但是已经具备了运动的重要特征，即利用道德感召力，将西印度群岛的糖与奴隶的苦难血泪画上等号。这种被提摩西·莫顿（Timothy Morton）称为“血糖主题”（Blood Sugar Topos）的修辞策略，构成了该运动的核心话语范式 [11]。这种修辞策略在当时的废奴主义文学中被反复演绎利用，如1788年《苏格兰杂志》（Scots Magazine）刊载的一首诗歌：“难道滴滴鲜血就是那恐怖肥料/令饱满甘蔗饱胀甘甜汁液？” [11] 基于此，废奴主义者在戒绝运动中极力唤起消费者的共情，并将消费奴隶糖与间接参与奴隶制暴行相联系，促使他们体会黑人奴隶的苦难，从而达到为废奴运动制造声势的作用。

此外，戒绝运动又触及当时其他英国社会运动少有触及的领域，即妇女主导的家庭，大大加强了运动的社会包容性 [9]。她们积极投身反蔗糖运动，在社区范围内组织起规模空前的抵制网络。18世纪90年代，女性参与形式仍以个体为主，但1791年林肯郡已出现突破性尝试——一群“兼具节俭美德与公共精神的女士”发起联署运动，集体签署了拒用蔗糖的公约 [8]。19世纪20年代，此类游说活动与反奴隶制文献的传播已形成更为系统的组织化运作。这一时期戒绝运动中所出现的反对西印度群岛“奴隶糖”话语成为之后反对关税特权运动的先声，戒绝运动本身也成为早期废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戒绝运动这一针对西印度蔗糖的抵制运动，不仅在经济层面产生深远影响，更在英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和道德伦理领域引发了变革。同时，“戒绝”（Abstention）一词的使用本身就强调自我克制，并隐含着通过摒弃罪恶获得道德救赎的深层宗教意涵。正如戴维·布里翁·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所指出的，戒绝运动蕴含着“足以动摇政府对废奴主义掌控的颠覆性力量” [8]。这一理念契合当时更广泛的社会思潮——关于奢侈与矫饰的讨论深刻影响着重商主义时代对消费和过度消费的辩论，同时与福音派及革命思潮对自我放纵、堕落与奢靡的批判形成呼应 [11]。

1.2. 东印度蔗糖产业的发展与“自由糖”形象的产生

戒绝运动与印度蔗糖的关联开始于18世纪90年代。此前，英国尚未从印度大规模进口商业用糖，然而当法属加勒比地区爆发的奴隶大起义以及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导致糖价飙升后，英国商界便将目光转向了印度。当时普遍认为，印度蔗糖的生产既可缓解短期短缺，又能降低英国对奴隶制产品的依赖 [12]。最初，东印度蔗糖似乎具有商业可行性。1792年有报道称，经精炼印度糖成本约为每磅两先令，“这一价格足以形成从印度进口糖的诱因，甚至无需调整关税” [13]。

然而，尽管当时的人从商业角度上看，进口印度糖是可行的，但一直到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却不愿意大规模提高印度地区糖的产量，印度蔗糖出口数量仍然不见增长。（见表1）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两个方面造成的：其一是受到印度地区种植条件与加工的限制；其二，《航海条例》赋予西印度群岛糖产业的保护性关税等特权使公司无法在欧洲市场与之竞争。同时，1813年特许状取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之前，英国私人资本几乎难以进入印度市场。因此，尽管19世纪90年代曾有私人企业家尝试运用西印度群岛的种植技术在印度建立甘蔗种植园，但均以失败告终。印度蔗糖生产的主体仍由小规模农户承担，他们将作物出售给当地精炼商，这种情况导致这些商人仅能生产少量低品质蔗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农户可能受到债务等各类社会经济义务的束缚，但他们始终被视为自由劳动者，而非奴隶 [14]。然而，尽管产量有限，一些颇具商业头脑的东印度商人仍窥见了市场机遇——他们借势废奴主义思潮，将所谓“自由种植”的东印度蔗糖标榜为“奴隶糖”在道德上的替代品。

表1 1805—1806年英属东西印度殖民地蔗糖出口份额

地区	吨数	占总量百分比
英属西印度群岛	170440	55.0%
英属东印度	7130	2.3%

早在1790年代初，市场上便出现了强调消费东印度蔗糖即是对西印度群岛奴隶制予以打击的广告宣传。印度的《加尔各答公报》刊登了一篇报道，其中以大写字母标出“东印度蔗糖！绝无奴隶血汗的纯净产品！！”（East India Sugar! Made Without Slaves!!）字眼 [15]。在伦敦，《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刊登了毕晓普门街史密斯-利珀商行的告示，宣称出售“自由民所产东印度蔗糖” [16]。克莱尔·米奇利（Clare Midgeley）指出，由于女性掌握家庭采购权，她们对零售商施加道德消费压力，促使部分商人在1790年代开始供应东印度蔗糖 [8]。1820年代，她们又采取类似策略——通过抵制销售或使用西印度蔗糖的商家，转而支持东印度蔗糖产品，持续施加消费影响。1828年，佩卡姆女性非洲与反奴隶制协会发布题为《选用东印度蔗糖之理由》的宣传册，宣称这一日常消费行为能以“最安全、最便捷且最有效的方式”瓦解奴隶制度 [17]。1824年，伦敦反奴隶制协会（London Anti-Slavery Society）直接推动以东印度蔗糖替代奴隶制产品的活动：8月设立临时销售点，次月又向詹姆斯·海伍德提供171英镑资金支持。协会领袖们积极动员各界购买海伍德蔗糖，强调其“自由劳工”的生产属性 [18]。

然而，东印度贸易与废奴主义者推广东印度蔗糖之间潜在的商业关联，并未逃过时人的觉察。1825年匿名刊行的小册子《致蔗糖消费者》警示国内消费者：“既得利益者正试图诱导你们购买所谓东印度自由劳工生产的蔗糖，并放弃英属西印度殖民地的种植园产品” [19]。

尽管东印度蔗糖的产量与进口规模始终未能撼动西印度群岛糖业的霸主地位，但其消费行为被赋予了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既为更广泛的反奴隶制运动造势，又在废奴主义者间培育了共同体意识，更是通过日常的抵制实践，持续唤醒人们对奴隶制罪恶的认知 [18]。因此，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该运动对西印度蔗糖进口量产生了直接影响 [8]，但显然这场运动，以及19世纪20年代要求糖税均等化的呼声，不仅对西印度利益集团造成了相当的威胁，更构建了关于以下议题的辩论框架：自由与非自由劳动条件的差异、各殖民地权利与特权的分配，乃至英帝国治理的焦点与意义。

2. 东西印度关税平衡论与东印度“自由劳工”神话的破灭

18世纪末的印度之所以成为废奴主义者取代西印度群岛生产的重要地点，是由于印度“未受奴隶制沾染” [20]。然而，时人的许多文献记载在很大程度上记录了印度众多地区中存在奴隶制以及与之相似的情况。这与废奴主义者所认为的“自由劳工”制度完全相反。同时，英国议会于1828年首次出版了关于印度奴隶制的议会报告，以近千页的内容记述了印度奴隶制的情况 [21]。1820年代英国议会也出现了要求东西印度蔗糖关税均等化的辩论，西印度集团更是直接点明印度存在奴隶制问题 [22]。这表明废奴主义者并非没有意识到印度的奴隶制问题，而是由于利益关系将之模糊化，甚至淡出废奴运动的议程之外。

正如夏洛特·萨斯曼（Charlotte Sussman）所指出的，大多数废奴主义支持者来自英国中产阶级，他们与工业革命的关联意味着这些人普遍倡导自由贸易。而奴隶制的拥护者则被视为重商主义者，其经济哲学被视为阻碍更具竞争力和高效市场经济发展的壁垒 [9]。这样的利益分野以及为了取得与西印度相似的贸易特权，促使废奴主义者攻击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生产的同时，创造一个由“自由劳工”主导的帝国生产地——印度。

2.1. 东西印度糖税平衡辩论及其失败

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印度的手工棉纺织业逐渐被英国工厂纺织业超越，英国能够以低于印度本土成本的价格返销印度。到了19世纪20年代，当废奴主义者开始大规模提出废除奴隶制时，印度的棉花生产也开始落后于以奴隶种植园为主要生产模式的美国南部和巴西 [12]。在这种背景下，东印度利益集团以及众多支持自由贸易的英国人士开始对印度的发展前景感到忧虑。他们期望通过发展印度蔗糖产业，并通过平衡东西印度之间的蔗糖关税，以挽救印度日益衰落的商业状况并进而摧毁西印度奴隶制。然而，西印度集团对于这种情况也针对东印度集团各种诉求进行相应的驳斥。双方围绕这一问题，在下议院进行了一场关于东西印度蔗糖关税均等的辩论。

1823年5月22日，英国下议院议员威廉·惠特莫尔动议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东西印度蔗糖关税问题。其陈述可分为三部分：其一关乎英国消费者的利益；其二涉及印度及我国与该国的贸易利益；其三关于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权益。他在其中强调针对东印度的高关税导致英国消费者损失多达两百万英镑。同时，日益加重的英印棉纺织业贸易顺差将摧毁印度商业进而导致印度殖民地的叛乱，损害英国的利益。此外，他认为自由劳动优于奴隶制，应改革西印度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成本。他列举了约书亚·斯蒂尔在巴巴多斯进行的实验，希望证明自由劳工制度远胜奴隶制 [22]。

大卫·李嘉图作为亚当·斯密的忠实门徒，秉持自由贸易理念，也在这场辩论中支持惠特莫尔的动议，他认为：“东印度蔗糖不会排挤西印度产品，所有殖民地进口都应免于限制——现行政策对殖民地和母国俱损，必须彻底废除。” [22]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威廉·威尔伯福斯则认为由于西印度生产的单一性导致国际糖价

主导黑奴的生活状况，这一状况在糖价低迷时导致西印度黑人奴隶的数量锐减，而美国黑人奴隶的数量却在稳定增长，并且他利用枢密院数据进一步指出牙买加岛的资本回报率仅4% [22]。

可以看出，惠特莫尔、李嘉图和威尔伯福斯等人在其陈述中从不同角度利用自由劳动与自由贸易的旗帜，对西印度各类问题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而他们的真实目的则是通过关税平衡来获得与西印度相似的商业垄断特权。正如西摩·德雷舍（Seymour Drescher）所指出的，19世纪20年代废奴主义者重新将印度视为取代西印度奴隶制的“自由劳动力”替代选项，这一转变的动因是源于这一时期蔗糖关税辩论中的经济驱动力 [12]。

然而，针对惠特莫尔和李嘉图等人的观点，西印度集团进行了相应的驳斥。他们认为东印度利益集团并非要求自由贸易，而是东西印度蔗糖关税平等，同时保留针对外国蔗糖的高额关税。他们仅仅要求获得足以取代西印度在英国市场地位的特权，继而垄断本国糖类供应。同时，西印度集团认为如若废除奴隶制、平衡蔗糖关税，那么西印度数量庞大的黑人奴隶将失业，激起殖民地的叛乱，导致英国失去西印度群岛重要的战略岛屿，进而导致英国殖民体系的崩溃。此外，他们也针对印度蔗糖产业的发展以及印度所谓的自由劳动提出质疑：白蚁灾害对印度甘蔗根系的破坏导致东印度蔗糖无法大规模量产；印度的种姓制度比奴隶制更为残酷，致使印度甚至无法与意大利自由劳工竞争丝绸生产 [22]。前文提到的印度棉纺织业和棉花生产的衰落便展现了印度的劳动形式既无法与自由劳动者竞争，也无法与美国与巴西的奴隶制竞争。可以看出，西印度集团的论点完全指出了东印度集团的根本目的，即扩大东印度现有的垄断权力。

这场辩论虽以蔗糖关税问题为核心，但涉及当时英帝国殖民地管理、帝国贸易模式、帝国安全和奴隶制等方面，兹事体大。此外，正如约瑟夫·马利亚特在这场辩论中所说：“听闻东印度公司股东们在议院高谈自由贸易之利，实乃绝妙讽刺——这群人正享受着世上最暴利的垄断特权。” [22]东印度集团希望假借自由贸易的名义，废除西印度的贸易特权与赖以生存的奴隶制度，这势必摧毁西印度殖民地，进而造成英国殖民体系的崩溃。因此，在自由贸易理论还未占据主流，重商主义垂死挣扎的1820年代，惠特莫尔的动议遭到议会保守派否决也是必然的。

2.2. 印度“自由劳工”神话的破灭

尽管历史学者对戒绝运动与糖税平等化政策的实际成效存疑，但西印度利益集团仍将这两场运动视为对其利益的重大威胁。抵制奴隶糖不仅直接影响西印度蔗糖业的发展，更通过“消费者可基于伦理与经济双重考量作出选择”的理念，颠覆了他们的重商主义世界观，代之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自由市场理念 [9]。然而，西印度种植园主并非束手无策。他们通过伦敦西印度协会（London West India Association），在议会内部乃至全国范围内都拥有“完善且制度化的支持网络”，可对抗废奴主义者的主张 [23]。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首要目的是试图瓦解东印度蔗糖的道德优越性，其手段一是质疑推广者的动机，二是拷问东印度劳工状况的实质。东印度蔗糖以“自由”为卖点的营销策略，诱使西印度辩护者攻击其所谓的道德优越性，从而制造出一个奇景：对东印度劳工状况最激烈的谴责、对印度贫困与苦难最尖锐的揭露，其执笔人并非福音派传教士或废奴主义者，而恰恰是西印度种植园奴隶主。

由于受到废奴主义者，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以及国内舆论的多方攻讦，西印度利益集团开始搜集各种资料，试图揭示印度劳工的“真正情况”，以挽救西印度蔗糖的消费形象并瓦解东印度蔗糖的道德优越性。其中，很多资料来自18世纪后期的东印度公司官员以及其他国家旅行家在印度的见闻，但是有很多资料是来自废奴主义者自身对于印度地区奴隶制的记述，其中最为关键的资料便是1828年英国议会出版的关于印度奴隶制的长篇报告 [21]。

1829年，西印度协会重要成员乔治·圣茨伯里（George Saintsbury）发表一篇名为《东印度奴隶制》的小册子，他在其中揭露了英属印度的“奴役劳工”情况，宣称“奴隶制盛行于全印；因此，印度与牙买加一样是奴隶殖民地” [24]。然而，圣茨伯里作为西印度协会的一员，其真实目的并非反奴隶制，而是为了破坏近年来废奴主义者与印度商业利益集团将所谓“自由劳动”的印度作为西印度奴隶生产地的替代地的企图。为此，他在小册子中利用1828年英国议会出版的关于印度奴隶制的报告，并依此对比西印度种植园中黑人奴隶的“优越待遇”与印度饱受贫穷困扰的农民的情况。由于圣茨伯里的政治倾向，他的言论受到了废奴主义者的主要舆论阵地《反奴隶制月刊》的攻击，后者将其描述为“肆意扭曲事实” [25]。

前文提及的匿名小册子《致蔗糖消费者》作者向读者发出诘问：消费者如何确信价格高昂的东印度蔗糖确属自由劳工产物？他坚称，人们在消费前必须查证这些蔗糖产自东方世界的何处？劳工又是在何种条件下受雇？作者警告道，“来自英属东方殖民地的蔗糖，并非全部产自其进口地，事实上相当部分并非产自英属印度，而是来自中国、爪哇、交趾支那和暹罗。”随后他更援引克劳迪乌斯·布坎南、詹姆斯·福布斯、詹姆斯·穆勒、杜布瓦神父乃至威廉·威尔伯福斯等各方人士的论述，力图证明“东印度蔗糖的生产者多为悲惨奴隶，其基本生存保障甚至远逊于我们西印度殖民地的黑奴”。同样，圣茨伯里也利用1828年英国议会出版的印度奴隶制报告，列举了一系列印度确实存在奴隶制的证据 [24]。

英国著名政论家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是东印度“自由劳工”观念的激烈批评者之一，他大量援引弗朗西斯·布坎南（Francis Buchanan）的记载来证明“东印度群岛的蔗糖是由奴隶种植的；这些奴隶是私有财产，可被买卖、抵押，像牲畜一样被出租”，并公开要求废奴主义者要么反驳此说，要么承认“阁下实为奴隶贩子，因贵方船只正忙于运载奴隶血汗的产物”[26]。

前文提到的英国下议院议员，奴隶主以及废奴运动反对者的约瑟夫·马利亚特在1823年出版的小册子中疾呼，“有人处心积虑地散布一种论调，声称东印度的蔗糖由自由人劳作所产，而非如西印度那般仰仗奴隶。某些良知未泯的虔信之士竟轻信此说，转而弃用西印度蔗糖、改用东印度蔗糖。然则最权威的证言足以证明：二者实则皆役使奴隶。”[27]马利亚特声称，布坎南关于其从马德拉斯穿越迈索尔、卡纳拉和马拉巴尔地区的游记记载，“不仅证明了奴隶制的存在，更表明在他所经省份——这些将蔗糖作为重要作物的地区——绝大部分农业劳动皆由奴隶承担”[27]。

西印度集团对东印度“自由劳工”真实情况的揭示，打破了东印度集团与废奴主义者自身利益而编造出的“乌托邦”神话。正如海地和塞拉利昂，印度仅是废奴主义者所期望的，作为废除西印度奴隶制生产后，替代其生产的理想地点之一[12]。在受到西印度集团的攻讦后，印度便迅速淡出废奴主义者的视野，并在1833年英国宣布解放奴隶之后，成为废奴主义者的下一个重要目标。

2.3. 双方的理论策略与实质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英国民众对于印度的认识早已不是早期东印度商人托马斯·罗笔下的“黄金国度”了。由于连年的战争与天灾，英国公众对印度农民显而易见的贫困早已知晓，这些农民仅能赚取“在气候温暖、土地肥沃之地勉强维持种族延续的最低微报酬”[20]。18世纪末的主流观点认为，莫卧儿王朝对印度农民的超经济剥削，已被同样贪婪的东印度公司全盘承袭。在这种情况下，西印度集团的论战策略便是紧抓印度人民的悲惨生活，构造黑人奴隶的生活优于印度人民的话语。东印度一方则无视英属印度地区真实存在的奴隶制问题，极力维护“自由”一词，将之比作可以超越物理苦难的重要人权。

19世纪20年代，西印度种植园主利用这场持续已久的论争，对所谓“自由”能否弥补印度劳工因农业灾荒与饥荒所遭受的苦难提出质疑。他们指责东印度公司加剧了“底层民众的压迫与苦难”，并指出英国棉织品的大肆输入已对印度本土纺织业及其赖以维生的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27]。他们还抨击了柴明达尔制度——这一被威尔伯福斯誉为“史上最睿智完善的制度”——指责其导致印度佃农（Ryot）陷入贫困，这些农民“为他人利益像奴隶般劳作，从无力改善自身处境或为老病积蓄”，也使每日仅获3便士工资的苦力遭受剥削[28]。同时，废奴主义者的批评者们则敏锐地抓住了其论述中的根本矛盾，即将印度廉价蔗糖生产与入道主义利益挂钩的悖论：“若言通过规范种植可改善贫民处境，吾必回应：此将背离根本目标，即生产廉价蔗糖。吾以为，唯因劳工所得近乎无，东印度蔗糖方能如其所言般廉价。然则，纵使此议题可基于政治与商业理由辩论，请莫再妄言每日三便士雇佣东印度劳工比之西印度奴隶更具人道——后者无疑享有与其卑微地位相称的诸般慰藉。”[29]

将西印度奴隶的处境与所谓“自由”却收入微薄、深陷贫困的印度农民悲惨生活相比较，这种论调延续了奴隶制拥护者长期以来的主张——他们声称自己的奴隶待遇优渥，甚至优于英国本土部分农民：此种论点既用以反驳废奴主义者对奴隶生存状况的抨击，亦旨在消解其“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由”的绝对道德立场。而废奴主义者从两个角度回应了关于印度农民困境的指控：其一驳斥所谓印度苦难的描述言过其实，其二强调“自由”本身的价值远胜于脱贫救济，将印度人民的苦难从宗教上、思想上进行“神圣化”和“自愿化”，并在所谓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将印度人描绘成低欲、消极之人。

常年处理印度事务的官员坚称，印度农民表面的贫困并未导致其痛苦或困厄，而恰恰体现了对“有限物质需求的自愿接纳”[20]。曾记录过印度奴隶制情况的东印度公司牧师威廉·坦南特（William Tennant）在1798年的著述中如此评述：“所有平民的劳作皆适度，其衣食之简朴几乎无可递减……匮乏在此常演变为饥荒：然而因气候温和，绝大多数民众几乎无需衣物蔽体、无需屋舍栖身。困顿之时亦无储备：一个仅靠劳力维生、或许身无两日之粮者，不被视为身处困境，反倒常觉幸福；至少他对明日毫无忧思……凡温暖国度，衣物几成多余，住所更显奢侈；是故当地民众之怠惰与无远见，若在尔等北方寒带，恐已招致灭顶之灾。”[30]这种明显带有强烈东方主义色彩的话语体现了当时英国人对印度人消极性、怠惰性、精神性及种姓制度的构想，并且巩固了如下观念：在这片丰饶宜人的土地上，除却获取基本生存所需——此目标在此轻易可达——绝大多数居民永不会为占有奢侈品、乃至我们所谓的生活便利而劳作[20]。

总之，如前文所述，支持东西印度关税平衡及支持东印度贸易的经济论述，均基于一项根本预设：印度劳动力无论何等廉价，本质仍属“自由”。然而至19世纪20年代，关于印度各类“非自由”劳动形式的信息已进入公众视野，并被用以抨击废奴主义论点，指控印度不仅存在贫困，更存在实实在在的奴隶制。而废奴主义者以“印度奴隶制与蔗糖生产无关，且相较黑人奴隶制度更为温和、仁慈”为由，轻描淡写地否定了印度奴隶制对其运动的重要性。^{[25]79}然而，此类主张显然与废奴主义者对“自由”原则的承诺颇显龃龉，暴露了废奴主义者对于印度奴隶制问题的偏见，将经济利益置于废奴事业之上的根本特点。

3. 结语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废奴主义者与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为打破西印度集团在英帝国市场内的垄断地位，为此不惜创造了一个神话——以“自由劳动”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印度殖民地，以取代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生产方式。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印度的真实劳动形式备受质疑，西印度集团甚至利用废奴主义者对于印度的观察，抨击印度的劳工情况。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20年代印度奴隶制问题提出的特定历史背景，从根本上塑造了废奴主义者的策略，这些策略更着力于将奴隶制与东印度蔗糖生产划清界限，而非从原则上予以谴责。尽管矢口否认，废奴主义者仅在面对西印度集团的揭露时才被迫回应印度奴隶制问题，直至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前，他们从未尝试将印度开辟为反奴隶制斗争的新战场。以至1833年废除奴隶制辩论时，印度已完全缺席，并且印度也被排除在废奴法案的范围之外。正如德雷舍所言：“作为英国自由劳工制的候选替代方案，印度与塞拉利昂、海地一样引发了太多疑问：其劳工究竟有多自由？其竞争力又当如何？”^[12]

就反奴隶制意识形态而言，学界惯常认为：“对废奴主义者来说，奴隶制与其他形式的‘非自由’劳动之间的差异——无论后者在今天看来何等剥削——都是绝对的、不可逾越的。”^[20]然而，在曾被设想为自由劳动的印度竟存在奴隶制，这一事实引发的经济与现实问题，迫使人们重新思考那些将奴隶制与自由绝对二元对立的理论，最终形成了一种修正的认知框架，以解释奴隶制在不同时空语境中的运作方式。在这一场东西印度论战中，辩论双方都将经济利益置于其他因素之上，从而产生了奴隶主大肆揭露奴隶制，废奴主义者小心遮掩奴隶制的历史景象。废奴主义者对待印度奴隶制的矛盾态度表明实用主义与经济考量对其政治理念的塑造力不亚于道德诉求，他们的立场并非绝对反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而是取决于其运动的宏观诉求。这一理念正符合这一时期英帝国历史剧变时期的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 [1] 钱乘旦. 英帝国史(第2卷)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 [2] DRESCHER S. *Econocide: British Slavery in the Era of Abolition* [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0.
- [3] DRESCHER S. *Abolitionist Expectations: Britain* [J]. *Slavery & Abolition*, 2000, 21(2): 1-20.
- [4] MINTZ S W.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M]. New York: Viking, 1985.
- [5] SHERIDAN R B. *Sugar and Slaver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 [6] 沐涛. 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2): 1-12.
- [7] FOX W. *An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on the Propriety of Abstaining from West India Sugar and Rum* [M]. London: Routledge, 1999.
- [8] MIDGLEY C. *Women against Slavery: The British Campaigns, 1780-1870*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9] SUSSMAN C.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Sugar, 1792* [J]. *Representations*, 1994, 48: 48-69.
- [10] MAJOR A. *Slavery, Abolitionism and Empire in India, 1772-1843* [M].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96.
- [11] MORTON T. *The Poetics of Spice: Romantic Consumerism and the Exotic*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2] DRESCHER S. *The Mighty Experiment: Free Labor versus Slavery in British Emancip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3] *The Morning Post and Daily Advertiser* [N]. 1792-01-09.
- [14] RATLEDGE A. *Competing for the British Sugar Bowl: East India Sugar, 1792-1865: Politics, Trade, and Sugar Consumption* [M]. Saarbrücken: VDM, 2009.
- [15] *Calcutta Gazette* [N]. 1792-05-31.
- [16] *Morning Chronicle* [N]. 1792-02-13.
- [17] NAISH, Peckham Ladies' African and Anti-Slavery Association. *Reasons for Using East India Sugar* [M]. London, 1828.
- [18] ANON. *To the Consumers of Sugar: A Reply to the Arguments Recommending the Purchase of East Indian Sugar* [M]. London, 1825.
- [19] DAVIS D B. *James Cropper and the British Anti-Slavery Movement, 1823-1833* [J].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1961, 46(3): 154-173.
- [20] MARSHALL P J. *The Moral Swing to the East: British Humanitarianism, India and the West Indies* [C]//Ballhatchet K, Harrison J. *East India Company Studies*. Hong Kong: Asian Research Service, 1986: 69-95.

- [21] Slavery in India, Parliamentary Papers (House of Commons) [R]. 1828, 125.
- [22]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Z]. 2nd ser. vol. 9, 1823.
- [23] DAVID LAMBER and ALAN LESTER, 'Geographies of Colonial Philanthropy'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8.3, 2004, p. 326.
- [24] SAINTSBURY G. East India Slavery [M]. London: Charles Tilt, 1829.
- [25] Anti-Slavery Monthly Reporter [N]. 1829, 3(52): 78-80.
- [26] Cobbett's 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 [N]. 1821-08-04.
- [27] MARRYAT J. A Reply to the Arguments Contained in Various Publications [M]. London: L. Relfe, 1823.
- [28] WILBERFORCE W, Wilberforce R I, Wilberforce S.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M]. London: J. Murray, 1840, p. 386.
- [29] Liverpool Mercury [N]. 1821-08-17.
- [30] TENNANT W. Indian Recreation [M]. Edinburgh: C. Stewart, 1803, pp. 134-135.